

数千年前,良渚“同款”玉琮已现广州 相隔1200公里的文明交流早就开始

在闭馆之前的30分钟,我赶到了这个玉琮面前。黑丝绒背景上,一束侧光,把五千年前玉器,映照得如莹光满月。杭州,良渚遗址,实证我们中华有五千年人类文化史,2019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年9月,也在一个中秋前后,我寻到了它。

为何一定要寻到它?作为历史上最有标识性的玉器之一,玉琮或由良渚先民首创,肩负沟通“天地人神”重任。早期玉琮可能由玉镯或镯形器演化而来,随后发展为祭祀重器。外方内圆、上下中通,它映照天圆地方,向宇宙洪荒发出万物之灵的追求和祈求。

这追求和祈求,是无形的愿力,也是实质的文化,它如水波涟漪,“自江以南”,对后来的“百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百越,先秦古籍对南方沿海一带诸族的泛称,百越有很多分支,有说法认为,其包括了吴越、扬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等众多越族支系(地域覆盖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北部一带)。

从杭州到广州的南方之地,在先秦时期,百越杂处,而玉琮,其实也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有联系了。从良渚开始,江浙一带的越文化,不断外扩,影响到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

比如玉琮,便是见证——

2021年中秋假期的第一天,也是一个9月,记者在广州南汉二陵博物馆,看到了一件广州出土的玉琮。黄埔区甘草岭出土。玉琮“同款”,原来早已早出“江浙沪包邮区”,一路向南。

“它是否来自良渚?”作为参观者,

我问。“商家是否直接从良渚原产地发货?”

“我们推测它也可能是利用广州本土玉石所造,当然,在形制方面,受到外来影响。”对方回答。“我们本地也有工厂和生产线。”

黄埔玉琮比良渚的那一件,小了一半有余,因为有所残缺,更显楚楚可怜。时光的深流,在它表面浸沁出孤白底色和细驳斑纹。射灯照耀在它“外方”的弧度造型和严谨的阴刻细线上。博物馆营造出的良好光环境,让它也如一轮兀自发亮、不觉自身盛美的小小月亮。

“玉琮(残),新石器时代晚期(3000-2000 B.C.),2017年广州黄埔区甘草岭遗址出土。玉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的筒形玉器,是我国古代重要礼器之一。源自环太湖平原的良渚文化,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晋南陶寺文化、粤北石峡文化等都有不少发现。甘草岭遗址考古发现的这件玉琮残器两端各有一从内侧向外钻孔的单面钻。由于磨损比较严重,已无法判断玉琮表面是否有线刻图案。但从材质和造型看,都与良渚文化同类器非常相似,说明了良渚文化因素经粤北石峡文化已影响到珠三角地区”,馆方介绍。

玉琮们见证了在同一片月光之下,相隔超过1200公里的同一片大地上的文明交流。数千年前,良渚文化的影响已至广州。

此前,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考古学家邓聪,在2019年接受中新社采访时曾指出,从最新考古发现来看,良渚文化玉器曾向四方急速扩张,其中向南发展



■玉琮,新石器时代晚期,2017年广州市黄埔区甘草岭遗址出土,广州南汉二陵博物馆藏。潘玮倩摄

规模聚集,影响直接且深远。他说,1973年,广东石峡遗址的发掘中出土大量玉器,显示出与良渚文化的密切关系。而珠三角黄埔甘草岭遗址出土的玉琮,从玉料及工艺分析,其来源于粤北石峡文化,又与良渚玉琮相当一致,“说明良渚玉琮南传已抵达南海沿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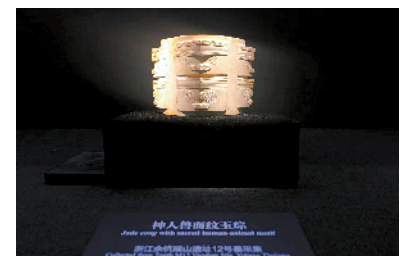
“对比显示,不论造型还是材质,(广州黄埔)甘草岭玉琮,都具备良渚文化阶段玉琮的因素,既是石峡文化玉琮伸延,也归属为良渚文化玉琮的体系。”

邓聪认为,“甘草岭遗址出土的夹砂陶鼎、泥质陶豆、玉环、玉琮等,都显示出其与粤北石峡文化、环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密切关系。良渚文化的余晖通过粤北石峡文化影响到珠江三角洲腹地既证据确凿,也表明珠江三角洲前沿地——香港涌浪及深湾的良渚因素镯及钺等,可能是一种沿海文化扩散的象征。‘香港涌浪的钺、镯及玦等来源,除可能由北江、西江南下外,另一条沿海路线亦不可忽视。早于上世纪30年代粤东沿海菝子园等地发现过典型的

石钺,粤东海丰田岬海岸发现过良渚文化因素玉琮及镯,是良渚文化之载体于沿海活动的重要证据。”

嗯,这里还在此链接一个消息,也就在2021年中秋国庆前夕,由国家文物局指导的“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初评结果揭晓,我们广东就有4项入围——广东南越王墓的发现与发掘、广东“南海1号”保护发掘、广东南越国官署遗址、广东石峡遗址。

百越流光,映照南越;石峡余韵,黄埔重彰。光如月满万山。



■神人兽面纹玉琮,浙江余杭瑶山遗址12号墓采集,良渚博物馆藏。潘玮倩摄

广州出土汉代珠饰赏析:

印度-太平洋珠,费昂斯珠 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流实证

撰文:邝桂荣(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管部主任)



■广州出土的汉代费昂斯珠,多面体,番禺汉墓M34:109。



■汉代印度-太平洋珠,2010年西湾路旧广州铸管厂M151出土,东汉前期。



■汉代印度-太平洋珠,2003年番禺小谷围港尾岗M6出土,东汉前期,系领形。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公元前214年,秦平岭南,建蕃(番)禺城,是广州建城之始。由于位珠江入海口,南邻大海、北通中原,蕃(番)禺城具有发展海上交通贸易的独特地理区位优势。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史学巨著《史记货殖列传》中将秦汉蕃禺城列为西汉帝国九大都会之一,“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反映出蕃禺城珍奇荟萃、商业繁华。

1953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广州发掘了数千座两汉时期墓葬,出土了大量材质丰富、形状多样、色彩斑斓的珠饰。科技检测和分析表明,这些珠饰除了本土制造以外,有些是利用本地原料对异域风格的器物进行仿制,有些是进口原料进行加工,也有些直接从域外输入,反映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以及科

技文化相互交流、影响与融合的过程,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甚至西亚及地中海沿岸地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交流的实证。

(编者注:在2020年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广州出土汉代珠饰》一书中,首次披露了大量一手资料,从广州地区1953年至2016年发掘的1500多座两汉墓葬中,筛选出土珠饰的242座墓葬,收集珠饰数量21303颗,从珠饰出土信息、材质鉴定、工艺特征,再到珠饰的类型学研究等诸多内容均囊括书中。限于篇幅,这里我们展现两类珠子,一窥其中璀璨。)

汉代印度-太平洋珠:印度-太平洋珠是广州汉代珠饰中数量最多的一

类珠子,总数超过10000颗,出土于200余座西汉中期至东汉时期的墓葬中。单个墓葬出土数量不一,少则一颗,多可达上千。数量最多的一座墓是1953年先烈路龙生岗东汉前期墓M43(广州汉墓M4013),有1966颗之多。珠子以中等钙铝型钾玻璃为主,低钙高铝型钾玻璃数量也不少,可能存在多个产地。有的可能为印度直接输入,有的是东南亚地区吸收了印度工匠的技艺生产制作,而后沿海路输入中国,有的则为本地利用外来技术制作。

汉代费昂斯珠:费昂斯是英语“faience”的音译,源自意大利语,本指中世纪意大利北部法恩扎(Faenza)出产的一种蓝色釉陶。因古埃及制造的一

种原始玻璃器与之色泽相近,因而被称为“faience”,此后便以此词指代原始玻璃。埃及人给滑石制作成的小珠子或石英砂胎体的珠子上釉,使珠子呈现光艳的蓝色和绿色,达到模仿绿松石和青金石一类的宝石效果。截至2016年底,广州考古发现费昂斯珠共89颗,均出土于东汉墓。经抽样检测,广州汉代费昂斯珠含有较多的氧化钠、氧化镁,氧化钾成分较少,其成分与国内釉砂存在差异,而与埃及西亚的费昂斯相似。在器形上,多面体、瓜棱形、菠萝形均不见于国产费昂斯珠,而具有西方风格;在时代上,国产费昂斯战国时已基本消失,而广州的费昂斯珠全为东汉时期,表明广州汉代费昂斯珠很可能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输入广州。